

# 過渡時期的「救時宰相」——子產 兼論《清華簡·子產》篇對《左傳》的 補充

李怡嚴\*

## 摘要

本文首先列出《清華簡（陸）·子產》篇的訴求重點，並以《左傳》所載子產事跡作印證，然後就〈子產〉篇出現的新資料來討論有關子產的問題。結論是：子產不能算是「法家」的開山始祖，祇能算是春秋世卿制度崩解前夕的救時者。在此過渡時期，他對「國人」與「野人」分別處理，為政的精神則有「禮」與「信」的差異。他的公布「刑書」，是為了立信，而非提倡「法治」。

**關鍵詞：**清華簡、子產、法家、刑書、救時宰相。

---

\*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退休教授

# **Zichan, the state-savior during a Transitional Period**

**Lee Yee-Yen \***

## **Abstract**

Citations from Zuozhuan are used to verify the main themes advocated in the newly discovered article “Zi Chan” appeared in the Tsing Hua Bamboo Manuscripts (清華簡). New materials in that article are discussed to rebut the conventional claim that Zi Chan was the fore-runner of the Legalist school in ancient China. I argue that Zi Chan was a state-savior of his time during the transistional period when the feudalistic system began to collapse.

**Key words: Tsing Hua Bamboo Manuscripts ; Zi Chan ; Legalist school ; The criminal code ; State savior**

---

\* Retir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壹、導言

有關子產的史料，一向集中在《左傳》。諸子書裡祇有一些零碎的遺聞軼事<sup>1</sup>。至於《史記》，雖列子產於〈循吏傳〉，又敘之於〈鄭世家〉，然而對於史實殊欠考訂，甚至兩處互相矛盾<sup>2</sup>，殊少參考價值。

《清華簡（陸）·子產》<sup>3</sup>包含了一些新資訊，是可以增進我們對子產的瞭解，可惜有用的材料還是不夠多。這篇文章，似乎是戰國時期的儒者借子產之名，來託古改制，以宣揚其政治主張。文章中的絕大部分，是透過一種制式的論辯，來建立一些抽象的政治原則。例如第一段的論辯，就是這樣進行的：

昔之聖君取處於身，勉以利民，民用信之；不信不信。求信有事：淺以信深，深以信淺。能信，上下乃周。不良君怙位固福，不懼失民。懼失有戒，有戒所以申命固位，位固邦安，邦安民遂，邦危民離。此謂存亡在君<sup>4</sup>。

我們必須由這些論辯的夾縫中，過濾出史實。

全篇文章共分十段，其中前九段都是像前引的那樣，以「此謂……」作結。中間的論辯，顯然對我們瞭解歷史很少幫助。在前引的那段，甚至沒有提到子產，而將所建立的抽象原則，歸之於「昔之聖君」，似乎此文的作者對歷史的事實不是那樣熟悉（或不是那樣有興趣）。

可是如果再看下去，就可以發現有些段落，的確將論辯的主角歸之於子產，甚至還引一些史實作為依據。由於此文作者似乎沒有看過《左傳》，他所引的史實，應是獨立於《左傳》之外，顯得格外有價值。

在下面的第二節，我將列出《清華簡（陸）·子產》一文前九段的大要，並且援引《左傳》中的有關記載，來為每一段所建立的抽象觀念來作印證。祇有在這麼做之後，我才能確定文中所指的「昔之聖君」、「君王」等名稱，還是在影射著子產。《清華簡（陸）·子產》篇的作

<sup>1</sup> 戰國諸子涉及子產而比較可靠的記載，主要在《呂氏春秋》與《韓非子》；在《孟子》中也有兩則（以乘輿濟人、受欺於校人，顯示子產的仁心）。其餘如列子、莊子、尸子等，多借子產之名以推行自己的主張，較少歷史價值。

<sup>2</sup> 例如《史記·鄭世家》謂子產為鄭成公少子，又謂子產卒於鄭聲公五年，皆誤。其年代亦與《史記·循吏傳》之「治鄭二十六年而死」合不攏。《史記·循吏傳》謂子產執政前「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云云，亦殊為失考。祇有記載子產死後民眾懷念之情：「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有一些參考價值。

<sup>3</sup> 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子產》（下文簡稱《清華簡·子產》）的說明、釋文與註釋，第136頁至第145頁。下面引文不再說明。

<sup>4</sup> 本文所引《清華簡（陸）·子產》的段落，並不用其隸定，而是接受了〈釋文〉括弧中的解釋（否則就必須造新字）。

者祇是為了求行文的變化，才在有些段落不提「子產」。這樣才能放心利用文中有限的歷史資料去補充《左傳》，並進一步瞭解當日子產的政治環境，是在世卿制將崩潰前，過渡時期的情況。而子產卻能在此情況下，達成「救時」的任務，這是以後數節的內容。

## 貳、《左傳》對《清華簡（陸）·子產》篇的印證

〈子產〉篇的全文，經過李學勤教授的釋文與註釋<sup>5</sup>，已大致可讀。本文將前九段的主旨列出，並用《左傳》中相關的史料來印證。

1、第一段的全文已在前一節引出，雖然以「此謂存亡在君」來收尾，全段的主旨卻在強調執政者必須達成上下的互信，尤其是得到民眾的信賴。《左傳》有一段記載，特別顯示子產堅持對商賈的守信，甚至不惜抗拒晉范宣子的要求。〈昭公十六年傳〉記載：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弊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僞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

鄭商何以堅持「必告君大夫」？必定由於以區區之商人，不敵晉卿之勢，交易必有吃虧之處，他提出對子產的信賴，是作為自保的最後一著。而子產也宣稱由於與商人有盟誓，不能失信以造成對商人的威脅。由於子產的堅持，鄭國商人對政府的信任遂能維持，而商人由於受到保護，能夠發展而增強國力，這就是〈子產〉篇所謂「存之在君」的原由。當然這祇是一個例子，由於涉及韓宣子，而為《左傳》記下。然而子產既然會對商人守信，當然也會對其他「國人」以及民眾守信，因此「上下乃周」。

2、第二段一開始就將議論的主體指實為「子產」，終結為：「此謂亡好惡」。段中主旨強調子產始終以君子之心為政，能夠自勝其好惡之心，而達到中道。《左傳》的確有幾次這樣的記載，尤其是在他執政之初，面對強大的公族壓力（特別是駟豐兩家），往往對他的施政掣肘；在這種情形下，子產還能克服自己的好惡之心，以達成中道，這相當不容易。謹舉豐氏兩人為例，

<sup>5</sup> 有些細節可能需要商榷，由於不太影響主旨的瞭解，本文不再追索。

公孫段（伯石）原本已是上大夫，在伯有死後，本來有資格晉升為卿，可是他為人太虛偽，往往有種種做作。《左傳》記載：

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安往？」……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

伯石雖然喜歡虛飾，可是為人還不太壞，做事還能達成使命，因此子產始終克制著自己的反感，而與他正常相處。當然，在瞭解到他的短處之後，不會讓他碰真正重要的事。

對伯石的弟弟公孫卷（子張），子產卻遭逢到更大的困難。《左傳·襄公三十年》載：

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如果不是子皮（罕虎）用他強大的貴族力量干預，子產在鄭國就待不下去了。可是子產在三年之後還是復了他的大夫之位，並且不沒入他的田里，原因是豐卷的行動僅對子產造成威脅，還沒有成事就被子皮制止且驅逐，沒有造成大亂。出奔三年之後，子產覺得他已受夠了懲罰，而且也已失勢，不會對鄭國造成災難，故復他大夫之位，這是「以直報怨」，可謂合乎「中道」。3、第三段的開頭，並沒有提這段議論的主體，應該仍沿襲上一段為子產。這一段的結論是：「此謂嘉理」，整段的主旨，在強調施政必須著重禮；所謂「禮」，不僅是表面的儀節而已，而且須出言與行事審慎，自知在哪些地方有理，這些都是「勉政、利政、固政」的先決條件<sup>6</sup>。

在《左傳》中，子產行止有禮，是出了名的，〈襄公三十年傳〉載：

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在上一年，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也不忘提醒：「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對禮的主張，對其後輩子大叔談過，子產去世以後，子大叔轉告晉國的趙簡子。〈昭公二十五年傳〉記載子大叔轉述的話：

<sup>6</sup> 子產的外交辭令一向以犀利著稱。其實他是以深厚的學問為根底，加以審慎判斷的結果，故能無往不利。這裡不再就這方面追索。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鬥，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在春秋中後期，已有種種嘗試，想將原來行於貴族之間的「禮」，推廣到較低層的「國人」。因為那是一個過渡的時期，「國人」的努力（如商人弦高主動前往犒賞秦師）也可對國家有貢獻。因為適用範圍的擴大，故對「禮」的詮釋，必須基於普遍的人性。子產的這段議論，可以代表這種嘗試。

4、第四段的開頭是：「子產不大宅域，不建臺寢，不飾美車馬衣裳」，結尾是：「此謂卑逸樂」。主旨是：子產主觀地認為享受與逸樂是不好的，應該避免；「勿以屏也」，因為「宅大心張，美外慙，乃自失。」由《左傳》的記載看，子產的「國氏」雖然也屬於「七穆」之一，卻從來不是大族。他的父親公子發（子國）雖然當過司馬，可是當遭到西宮之難，他與子駟、子耳同被「盜」（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所殺時，子產所能掌握的僅是兵車十七乘，他就憑這十七乘兵車攻入北宮平亂。亂平後，公子嘉（子孔）執政，子產沉潛約有十年之久，一點也不為自己打算。到魯襄公十九年，子孔受誅後，子產始被立為卿，雖然多所立功，他卻經常謙虛地推辭賞賜。鄭伯賞入陳之功而賜之六邑，子產也辭去了一半。七穆中雖有很多人習於奢汰，子產之族獨無之<sup>7</sup>。

子產於魯昭公元年聘晉，並問晉平公疾，對晉君疾病的議論，可以反映子產了解逸樂之害，可用於照應此段的結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能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盭之，則生疾矣。」

5、第五段的主旨，強調執政者必須抱著「君人亡事，民事是事」的態度，不以私事使民，對官職「非所能不進」。結論是：「此謂不事不戾」。

<sup>7</sup> 〈昭公七年傳〉載：「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子皮在「七穆」中素有賢名，連他也無法阻止其族人因奢汰而起衝突，其他貴族可想而知。

這一段講執政者蒞民之道的，可是中間的論辯反而將這個目標模糊了。其實由《左傳》看來，子產很注重民政，在還沒有執政時，他就與然明討論過。〈襄公二十五年傳〉記載：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他執政後心中始終有一個準繩：就是在施政過程中，盡量避免犯錯。這個準繩，子產平日雖未掛在嘴邊，卻在晚年有一次對富子發脾氣的時候，漏了出來。〈昭公十六年傳〉載：

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僞之恥也！」

這才是真正的「不事不戾」。

6、為了避免掛一漏萬，第六段文字還是整段照錄好：

有道之君，能修其邦國，以和民。和民有道，在大能政，在小能支；在大可久，在小可大。有以答天，能通於神，有以徠民，有以得賢，有以禦害傷。先聖君所以達成邦國也，此謂因前遂故。

由於子產始終在鄭國執政，而相對來說，鄭國是一個小國。因此這裡的「在大」，應指「事大」而言，即以「國小而偪」的鄭國，透過種種途徑，來應付大國（晉楚）的誅求。下面的「在小能支」，指的是讓鄭國本身的民眾能夠支持，不至於負擔太重，甚至可以享有幸福的生活，可以吸引外邦民眾與才幹人士至鄭。我想這就是「在小可大」的意義。

子產在處理對晉楚的外交事務，是全力以赴的。他的基本方針，是「事之以誠」，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用自己的才幹去幫助晉楚解決他們的問題，以贏得他們的感激與尊重<sup>8</sup>。

對於大國的誅求，由於當時的慣例，「盟主國」可以要求小國諸侯輸幣，子產無法完全避

<sup>8</sup> 例如〈昭公三年傳〉載：「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又〈昭公四年傳〉載楚靈王問禮於子產，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又回答「諸侯其來乎？」的問題，答稱除了魯衛曹邾四國外，其餘必來。在回答時還不忘規勸：「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昭公元年傳〉載子產回答晉叔向所問：「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詳述其典故，然而認為山川星辰之神與晉侯之疾無關，另進「君子有四時」之說（見第四段所引）。又提醒晉侯有四個同姓姬妾，可能為得病之源。〈昭公七年傳〉載子產回答晉韓宣子問晉侯「黃熊入於寢門」之夢，子產謂可能是鯀之神，並建議韓宣子祀夏郊。

免，祇好用外交途徑求盡量減輕，並盡量減少附加的花費<sup>9</sup>。在他未執政時，就已經寓書勸晉之范宣子輕幣。〈襄公二十四年傳〉載：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僞也惑之！僞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可是大國的欲壑是難填的。晉國作為「盟主國」，往往不能替小國解決問題，反而多所誅求。到魯襄公二十七年向戌「弭兵」後，本來祇向晉國輸幣的小國，又必須向楚國負同樣的義務。鄭國夾在晉楚兩大國之間，向來就需要向兩邊討好，趁著「弭兵」後的和平時期，力圖增加生產以開源（不僅在農業），還感覺好一些。可是拖到魯昭公十三年，還是受不了了。《左傳》記載，此年子產與子大叔相鄭伯到晉國平丘會盟。就在這個盟會中，子產抓到機會又請求減低貢賦。〈昭公十三年傳〉載：

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子產爭承，言辭雖有強辭奪理處，可是辭鋒銳利。晉人似乎怕了他，答應他的請求。其實那時晉與魯國交惡，無暇對付鄭，卻被子產抓到機會，無怪乎孔子要稱讚他：「足以為國基矣。」

在晉楚兩大國的夾縫間，鄭國維持了數十年沒有戰爭的和平，可是子產對兩大國的野心仍然沒有疏忽提防。〈昭公元年傳〉載：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

<sup>9</sup> 例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載，子產相鄭伯如晉輸幣，由於一時不能陳幣，子產使壞其館之垣，以納車馬，並乘機責備晉人招待諸侯的館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結果趙文子道歉。又如《左傳·昭公十年傳》載，晉平公卒，鄭子皮赴晉會葬，子皮不聽子產之諫，載幣而行，結果不獲見新君。子皮盡用其幣而回，始佩服子產的先見。



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在伯州犁強辯後，子羽索性攤開來講：「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

〈昭公十八年傳〉載：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

對付晉邊吏之責讓，子產用不卑不亢的辭令反駁，終於令晉人語塞，這就是子產「在大可久」的措施。

當然，對晉楚的貢賦還是要應付。為了開源，子產不得不作丘賦，為此還被「國人」毀謗，而子產始終堅持。對於這個問題，下面會用專節來討論。這裡先提醒一句，謗者為「國人」而非「野人」，可知這不是田賦。子產的措施，有利於賦稅的均衡，這可以印證《清華簡·子產》篇的「在小能支」、「在小可大」。事實上子產是詳細考慮了鄭國的環境，才推出這些政策，這可以印證「因前遂故」的段尾結論。

7、第七段也值得整段錄下：

前者之能役相其邦家，以成名於天下者，身以處之。用身之道，不以冥冥抑福，不以逸求得，不以利行德，不以虐出民力。子產傳於六正，與善為徒，以愆事不善，毋茲違拂其事。勞惠邦政，端使於四鄰。怠弁懈緩（此句意指官員怠於緩急的政事），更則任之，善則為人，勛勉救善。以助上牧民，民有過失教佚，弗誅，曰：「苟我固善，不我能亂，我是荒怠，民屯剝然。」下能式上，此謂民信志之。

春秋中葉的鄭國，政權仍在貴族手中，六卿與大部份的大夫，都由穆公的子孫輩族人輪流執掌。對這種狀況，子產也無能為力，祇能勉力適應<sup>10</sup>。好在罕族的子皮極力支持他，對此他也極為感激，並對子皮知無不言，以為報答<sup>11</sup>。對其他的人，他以誠心爭取到印氏與游氏兩族支持他；對於已失敗而死的良霄，他基於同胞之愛而殯葬之。為此，他得罪了駟豐二氏，面對這

<sup>10</sup>《孟子·離婁上》還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到孟子的時代，貴族的世卿制度已經崩潰，而孟子仍如此講法，可知在政壇中的惰性，是多難克服了。

<sup>11</sup>《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載子產諫子皮使尹何為邑，而講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話：「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從此以後，子皮對鄭國的政事盡量聽子產的意見。

兩族的壓迫，他祇能以一身面對（以身處之）。如果不是子皮的強硬支持，他早已出奔或甚至可能被殺，更不要講執政了。

然而子產始終以光明磊落的態度處之（不以冥冥抑福，不以逸求得，不以利行德）。對豐卷的蠻幹，子產在逐出三年以後復其大夫之位，而且還其田里（見第二段的討論）。對子皙與子南爭室一事，子產顧慮駟氏的內底，放子南以避其兇鋒<sup>12</sup>，讓子皙誤以為他的蠻幹的方法奏效，更加變本加厲，於「薰隧之盟」矯君位，最後危及駟帶之位，才數三罪以誅之。必定要用這種迂迴的方式行事，以求避免更大的內爭，這可以印證「不以逸求得」。對於公孫段的虛矯，子產掌握到他「器小易盈」的特點，升他為卿，並讓他有機會得到晉國韓宣子所賜的州田。終他之世，沒有再引起麻煩<sup>13</sup>。

對於子大叔，子產開誠布公，與他合作施政；同時竭力訓練他成為自己的接班人，經常開導他有關政策的疑慮。當鄭簡公的葬除以及以後因火災的大蒐，子產都避過不毀游氏廟；到臨終，他還不忘提醒太叔施政不能太寬。對待一般的貴族，他的策略是：「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sup>14</sup>。」此可謂「以愨事不善，毋茲違拂其事。」

至於面對一般民眾，子產的做法是盡量提升政事效率。他所推行的一些措施，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等等，民眾在開始時總會不適應，不免會發怨言。子產為了貫徹其政策，必需有所堅持，那時更是：「以身處之」，以期待民眾的逐漸習慣。《左傳·襄公三十年》載：

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後來他為了開源而作丘賦，更是需要面對國人之謗言：「其父死於路，己為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他處置謗言的態度，是堅持而不壓抑；他說：「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雖然到了最後，大家都能瞭解他的苦衷而合作，可是在開始時，「以身處之」的困擾也夠他忍受的<sup>15</sup>。他不壓抑民眾的謗毀，最有名的事跡，就是「不毀鄉校」。《左傳·

<sup>12</sup> 《左傳》載：「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子大叔。」可見這是個權宜措施。

<sup>13</sup> 薰隧之盟，《左傳》稱：「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子產用這一招推出公孫段主盟，因而防止豐氏與子皙的聯合。

<sup>14</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181。釋「斃」為「踣」，義為罰而使之去職。

<sup>15</sup> 為此他還被渾罕詛咒「國氏其先亡乎！」其實子產之子國參（字子思）一直在鄭國卿大夫之位。《春秋經·昭公三十二年》記載他代表鄭國城成周。至魯哀公二十七年鄭國抵抗晉知伯之役，子思還在，離魯昭公二十年子產去世，已經四十七年了。可知《左傳》記載此事，祇是為了突顯渾罕的無稽。

襄公三十一年》記載：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左傳》這些描述，我認為是《清華簡（陸）·子產》第六段：「民有過失赦佚，弗誅，曰：『苟我固善，不我能亂，我是荒怠，民屯剝然。』下能式上。」一段話最好的印證。

8、第八段的重點是：「子產用尊老先生之後，乃有桑丘仲文。杜逝、肥仲、王子伯願；乃設六輔：子羽、子刺。蔑明、卑登。富之鞭，王子百。」<sup>16</sup>這段的主旨，無非是子產施政時能善用別人的智慧。中間列出他的師承與輔佐者的名字，是〈子產〉篇的特色。至於前面的一段論辯：「古之狂君……重任以果將」，近於老生常談，我認為沒有必要抄在這裡。後面一段說他流竄了一批人：辛道、[倉攵]語、管單、相冒、韓樂，其罪名或是虛言無實，或是生活奢汰，（飾美宮室衣裳，好飲食[酉枳]釀。）有些空泛；不過也許可作「泰侈者因而斃之」一語的印證。那些人名，在已知的文獻中也找不到根據，我認為可疑，祇能當作是戰國時各種誇大傳言的一部份。

《左傳》沒有記載子產的師承，可是由子產廣博的知識看來，他所受的教育一定非常扎實。由他勸諫子皮之言<sup>17</sup>「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可知他自己在入政以前，一定做了充份的準備。他自小就聰明，在魯襄公八年（當時他僅十六、七歲），全國都在為侵蔡獲利而欣喜時，唯獨他擔憂：「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為此他還被父親怒責。兩年後，他的父親子國在西宮被殺，他就已能鎮靜應付：「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並且還能率領十七乘兵車攻盜於北宮；事定後，又能力諫子孔焚載書，可見當時的能力已經相當強。可能他在童年時，在家已接受了充份的（貴族）教育。從魯襄公十年到魯襄公十八年一段時間，鄭國由子孔執政，子產為了表示無意與子孔爭權，讓他「子得所欲」，完全絕跡於政壇。我認為他在此時期可能在外國從師，以求學問的深造，同時亦藉此躲避子孔的迫害。《清華簡（參）·良臣》列出「子產之師」四人，其中有三人

<sup>16</sup> 這可以與《清華簡（參）·良臣》相印證。可惜〈良臣〉篇僅有人名而無事實。

<sup>17</sup>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載子皮欲使尹何為邑，以為：「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諫止之。

與《清華簡（陸）·子產》所列「先生之後」相同，可見多少有些根據。可是這些人名又不見於其它文獻（尤其是《左傳》），我猜想他們都是子產在國外所從之師。其中有「王子伯願」，很可能就是周之王子。鄭國鄰近於周，很可能有一段時間，子產在周從師，並得觀周室的府藏典籍<sup>18</sup>。

至於〈子產〉篇的「六輔」，大部份都在文獻（尤其是《左傳》）中有所記載，也與〈良臣〉篇相符。其中「子羽」（即公孫揮）、「蔑明」（即然明）、「卑登」（即裨諶）三人最常見。「富之鞭」很可能就是《左傳·昭公十六年》諫子產的「富子」。僅「子刺」與「王子百」二人未見，不過鄭國有「王子」氏，如《左傳·宣公六年》批評公子曼滿欲為卿的王子伯廖，《左傳·襄公八年》鄭及楚平後告于晉的王子伯駢等，可能「王子氏」世為鄭大夫，「王子百」可能是其後代。祇有「子刺」沒有著落。可是《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傳》載：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sup>19</sup>。

這裡出現的「馮簡子」，也出現在同年稍早記述歡迎北宮文子的文字中：「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顯示馮簡子應該也是重要的鄭國大夫。「簡子」的稱呼像是諡號，而不像名字。與《清華簡·子產》比較，我很懷疑「子刺」就是馮簡子的字，其人也許年齡較高，經驗豐富，故擅長於決斷；可是他也可能比較早去世，故在《左傳》後文中不復見。

第八段的宗旨，應是子產受四位師長的教育以打下根柢，再善用六輔（應該還加上子大叔），使鄭國有數十年的治世，自然有過失的人就少了。這應該就是該段的結論：「此謂由善散愆」的精義。

9、第九段的主旨很簡單，但非常重要。關鍵的字眼是子產「肆三邦之令，以為鄭令、野令」、「肆三邦之刑，以為鄭刑、野刑」。這份資訊，可謂大都是全新的，是《清華簡（陸）·子產》對古史最重要的貢獻。這一段告訴我們，子產在鄭國主持編製了四份文件：鄭令、野令、鄭

<sup>18</sup> 《莊子》記載子產師事「伯昏無人」（見〈德充符〉篇），《列子》作「伯昏瞀人」，其內容似為寓言。然而，既然提出「伯昏無人」的名字，可能當時有此一傳說。我懷疑「伯昏」是「伯願」的誤傳。在上古韻部中，「願」與「昏」相近，「願」屬元部，「昏」雖屬「文」部，可是在詩韻中「昏」卻屬「十三元」，可見二字韻部可通。至於聲母，二字同屬牙喉音，發音亦相近（願字屬疑紐ŋ，昏字屬曉紐x）。

<sup>19</sup> 《論語·憲問》也有類似的記載：「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當然，孔子所引述的過程是「為命」而非「諸侯之事」，可是一樣顯示出子產唯才是視，以及不專擅的態度。

刑、野刑。並且在編製時，是參考了「三邦」的材料。這裡唯一可以和《左傳》印證的地方，是〈昭公六年傳〉所載子產鑄刑書的事，值得拿來比較：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姑且不去評判叔向的意識型態（下面另談），先解決「三邦」的問題。據李學勤教授的〈註釋〉，「三邦」指夏、商、周<sup>20</sup>，對此解釋我不敢苟同。夏、商、周在傳統上稱為「三代」，未聞稱為「三邦」。且夏商年代久遠，連孔子都認為文獻不足徵，子產由哪裡找到資料來參考？戰國時期往往有託古改制者（例如《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流傳著一些三代的史料，大多不可信。我不認為子產會將全心投入的「令」與「刑」，根植於不可信的傳聞上。我認為這裡所謂的「三邦」，是與子產同時期的春秋諸國。「三」，按汪中〈釋三九〉，是虛數。如果一定要指實，則晉楚兩國的做法，都可能是子產參考的對象（也許還可以加上管仲時期的齊國）。〈子產〉篇說子產「為鄭刑、野刑」，可見他在鑄刑書的時候，把「鄭」與「野」分開。前者的對象，是鄭都邑中的「國人」；後者的對象，是在野地工作的農夫。至於上層的貴族，那時鄭國政壇還沒有完全脫離「刑不上大夫」的意識型態，需要執政者特別處理。看子產在放逐游楚的時候，宣布的罪狀是：「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就可以知道，子產不會將上層貴族當成「刑書」的處理對象，這完全是過渡時期的特色。

至於「鄭令」與「野令」，我認為那些是管理「國人」與「野人」的政令，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也許包括稅賦辦法之類行之有效的政策。〈子產〉篇的「令」字，本為「命」字，此兩字古時本相通。本文〔註十九〕所引《論語·憲問》孔子之

<sup>20</sup> 〈子產〉篇第九段「肆三邦之令」下的〔註七九〕說「三邦」，指夏、商、周。「三邦之刑」下的〔註八三〕說：「叔向使詒子產書，其中提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即此處『三邦之刑』。」

言：「為命，裨諲草創之……」的「命」字，其中可能就包含有「鄭令」、「野令」在內。〈子產〉篇第九段所強調的「行以尊令裕儀，以釋亡教不辜，此謂張美棄惡。」說得太玄虛了，我認為還不如《左傳》所載「輿人之誦」（見第七段的討論）來得明曉。就算他後來為了開源而作丘賦，而受到「國人」的謗言，子產還是「身以處之」，而不與校。久之，他的「救世」之心，終會大明。當鄭在晉楚兩國夾縫之間，數十年不受兵革（當然他不敢放鬆），民生逐漸寬裕時，民眾違反教令的情形當然會減少。這就是「張美棄惡」的印證，亦顯示他「救世」理想的成功。

### 參、子產時代鄭國政經局勢的揣測

鄭國位於中原四戰之地，雖在春秋初期（鄭莊公時）有稱霸之勢，後來卻受齊、秦、晉、楚相繼的攻伐，國內又屢次發生弑君事件，國力因此大衰。當齊、楚、晉輪流成為「盟主」時，鄭祇能托身在他們的旗下以求庇護。因此，百姓的民脂民膏，除了供應國內貴族揮霍之外，還要向「盟主」「輸幣」，可以想見執政者所面對的困難。鄭國並不像齊國那樣有魚鹽之利，也不像「泗上諸國」那樣，有平衍肥沃的田地。子產必須盡量利用鄭國本身的資源。

鄭桓公的封地本來在關西。到周幽王的末期，鄭桓公意識到周室危機四伏，聽從史伯的建議，將族人與財賄寄放於關東虢郕之間（即今新鄭縣附近）。後來就在這塊地方生根。當時此地人民怠沓<sup>21</sup>，其地多丘陵，不利於農業發展。可是那裡人口密集，交通方便，長久以來，就成為附近商品的集散地。這吸引了關西一批商人也逃難到此地，投到鄭桓公的轄下。他們能夠吃苦耐勞，所賺得的財富可以繁榮鄭國；他們也認同這塊土地，願意為鄭國的安全貢獻一己之力。《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載：

（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孟明的軍隊必定是在離鄭國還有一段距離時，就被發現了，不然，孟明不會就近滅滑。弦高的商隊遠行做生意，一定會有相當的資產；他們發現了秦軍，必定意識到鄭國將有災禍。他們不顧一切，假裝為鄭國的使者犒師，除了表現出應變能力之外，也顯示出對鄭國強烈的認同心。由此可知，商賈的確為鄭國生產經濟的重要部份。在過渡時期，鄭國大概會有一些官員管

<sup>21</sup> 見《國語·鄭語》史伯之言。

理他們。除此以外，當時的手工業，應該已經萌芽，在傳統的紡織業之外，礦冶也應該佔有一部份。鐵器那時應已傳入，不過技術還沒有太熟練，民眾不免以其為「惡金」而抗拒，僅用之為耒耜來破土<sup>22</sup>。丘陵地宜於畜牧，鄭國大概也不會放過，畜養的可能以牛羊為主，馬則不如晉國。就農耕來說，栽植的除了稷、黍、麥之外，也許還有桑與麻，以供應紡織的原料。對山林的保持，應該也是子產施政的一部份。《左傳·昭公十六年》載：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可知山林也應該是鄭國經濟的一部份。

〈子產〉篇認為子產施政，將「國人」與「野人」分別處理，「野人」應該就是農民。鄭國的農業環境並不好，田地受丘陵約束而破碎，用以灌溉的河流（洧水與溱水）短而促，而且水流量冬夏差別大，又常會鬧旱災<sup>23</sup>。子產對於田地的管理辦法，是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封洫是為了灌溉與水土保持，同時也讓田地分開而避免兼併。「廬」應該指農民聚居之屋舍，「井」應指為飲食與日常用的水而掘的水井<sup>24</sup>。那時的「廬」，是簡陋的茅草屋。那時的「井」，是丈餘深的淺井。廬需要經常維護，井需要經常漂洗。以五家為單位造廬與掘井，可以造得較堅固，掘得較深，維修與漂洗，可以分擔，顯然這是改善農民生活的措施。

子產對於農業生產一向很重視。他回答子大叔的問政，說：「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固然是用農功來比喻施政，可是反過來，也可以讓我們瞭解，當時當地的農民，需要不斷應付環境的挑戰。子產很瞭解農耕技術的局限，不會加重他們的負擔。所以日後子產為了開源而創的「丘賦」，對象應為居住於都邑中的「國人」，他們比較負擔得起。當然，抱怨而毀謗他的，也是「國人」。楊伯峻的〈注〉認為「丘賦」可能類似於〈成公元年傳〉的「丘甲」<sup>25</sup>，我認為「丘」是都邑中的區域單位，《莊子·則陽》有「丘里」，可作參證<sup>26</sup>。「國人」本來需負擔戰鬥的任務，等他們瞭解子產的策略，可讓鄭國數十年

<sup>22</sup> 請參閱李怡嚴《科學與歷史·論穆天子傳的西王母》，第222頁。

<sup>23</sup> 見於《左傳》的旱災。除前引〈昭公十六年傳〉的記載外，還有〈襄公二十九年傳〉記載「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飢，而末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這個大飢荒，很可能也是乾旱所引起的。由於乾燥，也容易發生火災。我揣測當時鄭國不宜於種稻。

<sup>24</sup> 請參閱李怡嚴、賴建誠〈論孟子的井地說——兼評梁啟超的先秦田制觀〉（《新史學》第十三卷第四期第119到164頁）。春秋中葉的掘井技術還不夠成熟，多數為淺井，為保持水質，需要經常漂井。而且當時不會用井水灌溉，尤其不會在田中央掘井。因為掘井會降低地下水的水位，反使農作物的根部得不到滋潤。如果再將井水汲出灌溉，根本是多此一舉。

<sup>25</sup> 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254。我認為不見得與「軍賦」有關。

<sup>26</sup> 可是對於《周官·小司徒》的所謂：「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的說法，我則抱保留的態度。《周官》應該是戰國末期的理想化建構，實際情形不會那樣整齊劃一。

免除兵革之苦時，自然就不會再毀謗子產了。

## 肆、子產對「禮」與「信」的態度

由子大叔轉述子產關於「禮」的話（見第貳節第三段的討論），子產似乎將「禮」奠基於人性。從理論上看來，似乎「禮」可以施予任何人；可是《左傳》上的子產卻沒有這個迹象。他竭力將「禮」用於貴族同僚，可是遇到既不講「禮」又不講道理的公孫黑，他還是不能不暫時妥協。《清華簡·子產》篇說子產將「鄭令」與「野令」分開處理。很可能他會嘗試將「禮」的適用對象擴大到「國人」。這裡他會發現單憑禮還不足以施政，他必須獲得民眾的信任，這就是〈子產〉篇第一段所強調的：為獲得商人的信任，他堅持不給韓宣子玉環。他鑄刑書的目標之一，也是企圖獲得民眾的信任，所以才將「鄭刑」與「野刑」的條文鑄在笨重的鼎上，並公開陳列，讓民眾瞭解這些條文的要求，一定會為執政者所信守，不致因人而變動。這種以「信」補充「禮」的想法，在數十年後就被孔子所繼承。《論語·顏淵》記述：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這裡以「信」作為一種德目，其淵源似乎起於集團之間，而非個人之間。這與後來「信」成為「朋友間的倫理」，是不同的。

可是在鄭國，當時的貴族集團間卻很難彼此信任，有時為了維持表面上的「信」，還不得不倚賴於訴諸鬼神的盟誓。《左傳》載駟良之事，說子皙發怒，將罰伯有氏，大夫們為了解，「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結果這種表面上的盟誓，效果當然不會長。有時子產自己，也必須參與這種形式上的盟誓。《左傳·襄公三十年》載：

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

而在伯有死於羊肆後，《左傳》繼續敘述：

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



即使到了子產執政之後，如前文的註十三所述，子產還是必須參與「薰隧之盟」，以應付公孫黑的危機。即使這是祕密的「私盟」，還是被公孫黑闖入而破壞。〈昭公元年傳〉載：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閭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何以貴族的卿大夫們需要一再靠盟誓來維持信任，甚至連鄭伯也需要與大夫盟誓呢？關鍵在於春秋中葉，世卿制度仍舊時興。在此過渡時期，各貴族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多（或多或少）擁有自己的軍隊<sup>27</sup>，權力不集中。子產自從解決了公孫黑以後，瞭解到盟誓不能達到維持公族合作的目標，對同僚皆以禮相待，從此不再有盟誓之事<sup>28</sup>。他並以實際行動來贏取民眾的信任（例如鑄刑書），卻不以「信」作為道德的要求。這是子產比同時期各國大卿夫高明的地方。

## 伍、子產有「法治」思想嗎？

因為子產有「鑄刑書」的舉動，顯然是鑄之於鼎，讓民眾都看得到。因此由清末起，頗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成文法的起源。梁啟超認為：

法家成為一有系統之學派，為時甚晚，蓋自慎到尹文韓非以後。然法治主義，則起源甚早。管仲子產，確已萌芽<sup>29</sup>。

鄭克堂著《子產評傳》在〈結論〉中強調<sup>30</sup>：

法治主義之出現於群治演進之世，完全關於法律能夠公開而已。倘不關於法律公開，則呂侯之刑書，何嘗不講法治？但不公開就不能算作法治，不公開就不能使貴賤一律

<sup>27</sup> 看到《左傳》敘述「子皙以駟氏之甲，伐（伯有氏）而焚之」與「子張怒，退而徵役（欲攻子產）」，就可知道各族擁兵自重的情況。〈襄公十九年傳〉載子孔被討時，「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可以想見當時需要用一場戰役來懲罰一個貴族集團。又，當時各族不但各自擁兵，亦各自有財源。這可從〈襄公二十六年傳〉所載，鄭人請釋印董父於秦，取貨於印氏而得知。

<sup>28</sup> 當魯襄公二十九年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的時候，裨諲就已經引《詩·小雅·巧言》的「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來譏刺這種行動。子產以當事人的身份，當然更瞭解「君子屢盟」的荒誕性。可惜春秋的其他國家，並沒有從鄭國的事件中獲得智慧。〈定公六年傳〉載：「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結果當然是盟誓無效，次年陽虎劫持魯定公與叔孫武叔以作亂。

<sup>29</sup> 見梁啟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編入飲冰室專集之五十），第132到133頁。他另有《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編入飲冰室文集之十五），可以參閱。

<sup>30</sup> 見鄭克堂著《子產評傳》第167頁。

平等。子產鑄刑書於鼎，就是將刑律公布出來，用以維持禮治不足支配的局面，誠不愧為救世主義。

可是《清華簡（陸）·子產》篇說子產將「鄭刑」與「野刑」分開處理。即使這兩份文件都鑄在鼎上，祇能夠警告民眾不要觸犯這些刑律，而不可能使貴賤一律平等。所以我認為，不能用戰國時法家的理想，去詮釋子產「鑄刑書」的行為。而且很顯然，「刑書」對於公族，也是不適用的。當子皙與子南發生爭妻的事件，子產的判語是：「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顯然將長幼列入判斷的標準。可是當子皙失去駟氏的庇蔭時，子產數子皙之罪，也有「昆弟爭室，而罪二也」一條。可見誰有罪誰沒有罪，還得看勢力而定，這完全不合戰國法家的精神。

在韓宣子聘鄭的場合，孔張後至以致失位，富子向他進諫：「孔張失禮，吾子之恥也！」子產卻認為這不是執政者應該負責的，因為孔張是子孔之後，屬於公族，他的私人行為執政者管不了，因此「僑焉得恥之？」所以除了分別「國人」與「野人」之外，還得將公族分開作為另外一類（用傳統的禮來管理）。可見這是一個過渡時期。

子產將他對於刑獄的態度，告訴了子大叔，後來子大叔又告訴了晉國的趙簡子：「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可知子產著重的，還是「使民畏忌」。這與他臨終前對子大叔講的話：「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是相通的。而將「刑書」公布出來，除了徵信於民外，亦可以增強這種「使民畏忌」的效果。既然公布了，子產當然有義務去維持其公正性，可是這是「守信」，而不是「守法」。「守信」也是子產單方面的，沒有要求對方也守；他對富子表示：「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僑之恥也」就是這種宣示。這是「立信」，還談不上有「法治」精神。

《左傳》並沒有交代子產「刑書」的內容與其根據，可是〈子產〉篇說他參考（原文為「肆」）了「三邦」的「令」與刑。前面我曾經假設，「三邦」應該包括晉與楚。進一步的考察，可以從〈昭公二十九年傳〉孔子批評晉范宣子的「刑鼎」一段話得到暗示。表面上看來，魯昭公六年晉叔向對子產的詒書，與孔子對范宣子刑鼎的批評好像很類似，其實不然。孔子應該很熟悉子產鑄刑書的事，可是並無批評，卻反而稱讚子產：「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可見孔子並不反對子產公布刑書。孔子在意的是刑書的內容。孔子批評范宣子刑鼎的話，著重在：「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這段話很值得進一步探討。

魯僖公二十七年的「被廬之蒐」與魯文公六年的「夷之蒐」，都是為了練兵。因為「師出以律」，所以軍刑之出現也往往較早，而針對民眾制定之刑律，往往也會參照軍刑之形式與精

神<sup>31</sup>。孔子認為晉文公無自私之心，守披廬的法則，故可以作盟主；而「夷之蒐」則被當時晉國諸卿的私心所介入，一蒐而三易中軍帥，徒啟爭端，故為晉國之亂制。由此看來，子產定刑書之內容時，可能會師法晉國披廬之法的精神，以大公之心行之，故孔子無譏。而范宣子的刑鼎，出於范宣子的私心，故孔子譏之。由此可以判斷：晉叔向詒書子產，無關於「禮法之爭」<sup>32</sup>。更不能由這段記載，判斷子產的拒絕，是出於法家的堅持。

固然，先秦法家派別也很多，我們不應以後世典型法家的標準來判斷子產。可是子產生活在春秋中期，那時諸子思想還沒有出現。子產對一般貴族還是守傳統的禮，祇是為了對庶民施政立信才定刑書，這還是符合孔子「教之」的原則的。觀孔子對子產的態度，就可知道他並不認為子產的施政有可非議的地方。我認為後世將子產列為「法家」的人，祇是想替戰國法家勉強找一個源頭，而不惜轉變歷史的判斷。因此，我堅決反對將子產列為法家。<sup>33</sup>

## 陸、結語：救世與救時

《清華簡（陸）·子產》的最後一段，似乎有一些費解的新資料，「為民型程，上下維輯，野三分，粟三分，兵三分。」李學勤教授的〈註釋〉認為這句話可能與叔向詒書中的「制三辟」有關；又懷疑「刑書」中會有「野」、「粟」、「兵」三部份。按前一段明言「野令」與「鄭令」分別，則此處不應有矛盾。從前面兩句著想，我懷疑子產為了增進行政效益，而將此三事皆三分，而由他自己，子皮與子大叔分別負責<sup>34</sup>。

<sup>31</sup> 請參閱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古代兵刑無別》（第十三章，頁82—84）。此文指出遠古時兵刑無別。由此我們才能夠瞭解到春秋時代，兵刑初分時，「刑」往往以「兵」為藍本。我認為唯有從這個方向去思考，才能瞭解何以孔子在批評范宣子的刑鼎時，會訴諸表面上不相干的「披廬之法」與「夷之蒐」。請注意孔子所講的「披廬之法」的「法」字，指「法度」、「法則」而言，以關合前面「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與後面的「若之何以為法」，而沒有戰國時法家所倡「法」的意義。事實上一直到《孟子·離婁上》的「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也還沒有涉及「律法」的意義。

<sup>32</sup> 〈叔向詒子產書〉一開頭就說：「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尤有酸味。叔向在晉國長期為大夫，卻始終被強族所擠壓而無緣晉升為卿。他當然瞭解范宣子所著的「刑書」的偏失，他自己甚至一度被捲入欒盈之獄，而幾為范宣子所殺（魯襄公二十一年）。面對這些強族，他無可如何。可能當時晉國諸卿已有意公布范宣子的刑書，可是還有所遲疑。晉國一向尊重子產，所以叔向希望子產能夠發揮一些影響力，去阻止范宣子刑書的公布（始吾有虞於子）。現在子產自己在鄭國公布了他自己的刑書，其中雖然沒有「夷之蒐」的缺失，卻容易被晉國當作口實而學樣，讓范宣子刑書之公布更無法阻擋，故叔向急到要詛咒子產：「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產在回信上說他不在乎（「僑不才，不能及子孫！」）等於給叔向一個軟釘子碰！事實上子產雖然沒有為子孫謀，其政策仍由子大叔所繼承。

<sup>33</sup> 同樣，我也反對將管仲列為法家。

<sup>34</sup> 這種分工的情形可能有點像《國語·齊語》中的「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的安排。《國語·齊語》出現的時間可能在春秋末期，很可能後於子產，可是也沒有證據說齊桓公時沒有這種制度。當時鄭國的貴族，自子皙誅後，駟豐兩族漸衰，僅罕游兩族為大。

在《左傳》中，子產對子皮與子大叔雖然屢作建議，知無不言，可是並沒有強迫他們接受自己的意見。例如〈昭公十年傳〉載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固請將幣以行，違子產之諫；結果祇能盡用其幣而歸。又如〈昭公十三年傳〉載子產與子大叔相鄭伯會於平丘，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減損之。在前一日，「子產命外僕速張幄幕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這裡顯示子產與子大叔很可能各有獨立的支援系統，平日不相干擾。當二人同時赴晉，失於協調，遂互相干擾，因子大叔的一時失算，影響到子產的幄幕也無地可張。這暗示平日在鄭國，也有分工的安排。

〈子產〉篇繼續敘述：「是謂處固，以助政德之固，固以自守，不用民於兵甲戰鬥。」這段話的確是子產努力的目標。他盡量使鄭國的國力投入生產，避免奢侈與浪費。他維持一定的兵力以固守，避免受到大國的侵陵，卻也不向外擴張，避免浪費民力。所創造的財富，除了應付大國的貢賦外，還得作災荒的準備（例如旱災與火災），再有剩餘，才能用於改善生計。子產對叔向的回信宣稱：「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他所救的「世」，也就是鄭國的現世。在子產為卿之前，鄭受晉楚兩國之交逼，被迫要「惟強是從」，不但要奉玉帛以求成，而且長年的軍事行動，使民生亦大受影響。到子產執政以後，終子產之世，鄭國沒有受到外兵入侵過。他祇用外交方式去爭取鄭國的最大利益，並杜絕大國的覬覦。子產有時貢獻其學識於晉楚（如魯昭公四年向楚國獻禮，昭公元年、昭公七年回答晉侯有關疾病的問題），都是藉此獲致大國的好感<sup>35</sup>，並趁機瞭解該國的政情。《清華簡（陸）·子產》說：「可用而不遇大國，大國故肯作其謀。」我認為講的就是這個意思<sup>36</sup>。

我並不否認《清華簡（陸）·子產》中有戰國人託古改制的地方，可是上面的那些引述，還是很能符合《左傳》對子產的描述，所以我認為值得採信。在檢視了〈子產〉篇的內容後，我們可以匯合它與《左傳》的相關部分來探討子產成功的因素：

子產所以能夠「救世」，在於他的博學以及基於學問而得到的高超判別能力。他能夠在最適當的時機，採取最適當的行動。當西宮之難，子產把握了最有利的時間，攻盜於北宮，而避免了政變之擴大。當子孔得勢，子產見機沉潛了約十年之久，以躲避迫害，並充實自己。當魯襄公二十二年，晉徵朝於鄭，初為卿的子產看穿晉國當時能力不足，祇是藉此下台階，故他的對辭暗示可能從楚以示其忌，又顯示守信的誠心以安其意；晉國真的為這些言辭所折。當子皮授政時，子產坦然拒絕道：「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必定要激使粗線條的子皮拍胸口答應：「虎帥以聽，誰敢犯子！」才答應接下這個擔子，並且恃子皮的支持，以整頓鄭

<sup>35</sup> 《左傳·昭公七年》：「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可見晉侯感激之情。

<sup>36</sup> 李學勤教授在〈說明〉中判斷：「〈子產〉篇末歎息子產沒有機會在大國執政，以致未能充分實現其理想抱負。」我反覆閱讀原文，感受不到有「歎息」的意思。原文想講的應是：子產雖然是鄭國的執政，卻也偶然向「大國」進言。他的誠意讓大國相信他真的想幫助該「大國」，所以放心接受他的進言。

國公族的頹風。當子皙肆行蠻橫時，子產首先不討以示弱，等到聽說駟氏也受不了他時，子產唯恐子皙得訊逃走，趕緊乘遽而至，迫令自殺，而且暴尸加木，趁機對失控的公族示威。當鄭國的強族都對子產歸心時，他主動分權給子皮與子大叔，以顯示他對子皮的感激並培養子大叔為接班人。當楚公子圍（即後來的楚靈王）城驪、櫟、郟時，子產判斷他將篡位自立，而且於鄭無害。子產遂乘此機會自強<sup>37</sup>，以擺脫楚國的勢力。當魯昭公四年，晉平公、楚靈王皆無暇謀鄭，而國內貴族多已歸心，子產知道積極革新內政的時機已臨，遂無視國人之謗而作丘賦，並於兩年後為使庶民免於刑戮而鑄刑書，以主動取信於民眾，並教育他們。當楚公子棄疾赴晉時，子產預料到日後他將為王，趁他路過鄭國的機會，陪鄭簡公前往慰勞，以先期結交。當「相驚伯有」的謠傳正盛，駟帶與公孫段相繼愧懼而死亡，子產了解到民眾在替伯有鳴冤，趁人心惶惶時，為伯有平反，並立公孫洩與良止，以取媚於民<sup>38</sup>。當魯昭公十三年，晉昭公趁楚靈王新被弑，楚國政局暫挫時，會諸侯於平丘以示威，子產看到晉國不能處理魯邾間的糾紛，知道晉國政出多門，其實色厲內荏，遂在盟會上爭承，從中午起爭到黃昏，終於逼得晉國讓步，為鄭國減輕負擔。當魯昭公十八年，鄭國火災，子產雖然不贊同裨竈禳火，其實無時不在戒備。當火起時，他指揮各官吏滅火與推行各項應變措施，秩序井然；尤其注重救助民眾（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他特別防備鄰國的趁火打劫：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授兵登陴以防晉，又於事後大蒐，以提高警覺。（試比較《左傳》所載魯國哀公三年桓僖災，群臣救災時雜亂而無統攝的情況，就可了解子產能力之高。）當他病重得將要死時，顧慮到子大叔的性格太柔弱，鎮不住刁蠻之徒，恐影響到鄭國的長治久安，遂把握最後的機會，提醒子大叔「寬難」的道理。〈子產〉篇的結論說：「知其所生，以先謀人」就是此意。

子產知道適「時」反應的重要，故能將鄭國從獨特的不利環境拯救出來。〈子產〉篇的結句：「以能成卒」就是此意。不但子產自己「成卒」，並且功延到子大叔之世，使鄭國安定數十年，可謂「救時宰相」<sup>39</sup>。（當然當時還無「宰相」之名，子產的地位是「當國」。）

《國語·晉語八》記載：「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顯示子產的諡號為「成子」，這可以與〈子產〉篇的結句「以能成卒」相印證。〈諡法〉<sup>40</sup>稱：「安民立政曰成。」這顯示鄭國對子

<sup>37</sup> 〈昭公元年傳〉載子產回應鄭人的憂懼道：「不害，今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又於楚靈王即位後回答子大叔的預測道：「不數年未能也」。到昭公四年，子產已經看出楚靈王一定會失敗。他對宋左師道：「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過十年！」

<sup>38</sup> 請參閱，李怡嚴：《科學與歷史·「人之無良」——伯有的勞騷》，第181-197頁。

<sup>39</sup> 請參閱，魏源：《魏源集·默觚上·治篇七》，第54頁。論「才臣」與「能臣」之別：「至若兼才能而有之，若管仲、子產、蕭何、諸葛亮，尤古今不數人也；姚崇、張詠，抑其次也。欲求救時之相，非才臣不可。」另外馮李驥的《左繡·首卷·十二公時事圖說》與姜炳璋的《讀左補義·卷四十》也提過子產為救時之相，可參閱。

<sup>40</sup> 〈諡法〉見《逸周書》第五十四篇。今本《史記》最後也有一篇〈諡法解〉，是《史記正義》的著者

產功績的承認。

## 參考文獻

### 一、傳統文獻

- 秦·呂不韋著，漢·高誘注：《呂氏春秋新校正》，臺北：世界書局，1972，《新編諸子集成》第七冊。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臺北：宏業書局，197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 漢·毛公傳，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臺北：宏業書局，197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宏業書局，197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2（《二十五史》台一版），縮版影印清殿版。
-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宏業書局，197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 吳·韋昭注：《國語韋昭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影印清嘉慶重雕天聖明道本。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宏業書局，197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 晉·郭象注：《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72，《新編諸子集成》第三冊。
- 晉·張湛注：《列子注》，臺北：世界書局，1972，《新編諸子集成》第四冊。
- 清·朱右曾著：《逸周書集訓校釋》，臺北：世界書局，1975。
-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72，《新編諸子集成》第五冊。
- 清·姜炳璋：《讀左補義》，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影印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亦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43—144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 清·馮李驊、陸浩：《左繡》，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影印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本；亦收入《四

---

張守節根據當時（唐朝）所傳的《周書》抄錄的。可是其文字與次序錯誤頗多，不如《逸周書》之文本可靠。

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41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清·魏源：《魏源集》臺北：漢京文化，1984。

## 二、近人著作

李怡嚴、賴建誠：〈論孟子的井地說——兼評梁啟超的先秦田制觀〉（《新史學》13.4，頁119-164）。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

梁啟超：《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編入飲冰室文集之十五），臺北：臺灣中華局，1960。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編入飲冰室專集之五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

鄭克堂：《子產評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

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